

雲間詩派 的詩學發展與流衍

謝明陽 著



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

謝明陽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雲間詩派的形成	17
第一節 雲間詩派的名義	19
第二節 幾社時期	26
第三節 雲龍唱和時期	38
第四節 雲間三子時期	51
小 結	61
第三章 雲間幾社的格調詩論	
——幾社時期的詩學議題	63
第一節 明代後期詩學語境的「格調」	65
第二節 雅正格調的追尋	73
第三節 色采丰姿與格調的融合	80
第四節 情志與格調的優先順序	89
小 結	97

第四章 陳子龍方以智的詩學論交與分趨

——雲龍唱和時期的詩學思辨·····101

第一節 論大雅相合而定交·····103

第二節 陳子龍詩學理想的堅持·····112

第三節 方以智早期詩學的轉向·····122

第四節 詩學思想與人格精神的分趨·····131

小 結·····139

第五章 明詩正宗譜系的建構

——雲間三子時期的詩學完成·····143

第一節 雲間三子的正宗觀念與選詩方法·····145

第二節 《皇明詩選》的宗派譜系·····154

第三節 揚丕基：李夢陽與何景明·····160

第四節 揚盛烈：李攀龍與王世貞·····169

第五節 譜系延續：雲間三子·····179

小 結·····193

第六章 清初西泠派詩學論析

——雲間詩學的內涵分化·····197

第一節 西泠派的文學活動·····200

第二節 雲間詩學的兩種接受態度·····	207
第三節 柴紹炳的大雅詩學觀·····	216
第四節 毛先舒的豔情詩學觀·····	225
小 結·····	234

第七章 孚社及其詩學考論

——雲間詩學的忠義傳承·····	237
------------------	-----

第一節 孚社的成立·····	240
第二節 孚社詩人的生命追尋·····	255
第三節 《今詩粹》的詩學立場·····	266
第四節 陳子龍的典範意義·····	277
第五節 慷慨悲壯的孚社詩風·····	287
小 結·····	297

第八章 結 論·····	299
--------------	-----

附錄：雲間詩派詩學活動繫年紀要·····	309
----------------------	-----

參考書目·····	329
-----------	-----

後 記·····	353
----------	-----

第一章 緒 論

主導明代文學思潮最主要的力量在於文學流派，甚至可以說，明代詩文理論的發展，也就是一部文學流派的演變史。爲了引領文壇風騷，明代文人盛行結盟立社，正如郭紹虞〈明代的人文集團〉一文所云：「標榜之風，固然古已有之，然而於明爲烈。明代文人只須稍有一些表現，就可加以品題，而且樹立門戶。」¹這樣的觀察無疑相當準確，然而此一標榜之風的興盛，背後還存在著特定的文化因素。事實上，對於文人必須聯絡聲氣方能主盟壇坫的時代趨勢，明人亦有深刻的自覺，例如夏允彝（1596-1645）爲陳子龍（1608-1647）作〈岳起堂稿序〉云：

唐、宋之時，文章之貴賤，操之在上，其權在賢公卿。其起也以多延獎，其合也或贊文以獻，挾筆舌權而隨其後，殆有如戰國縱橫士之爲者。至國朝而操之在下，其權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聲相引重，其成也以懸書示人，而人莫之能非。²

¹ 郭紹虞：〈明代的人文集團〉，《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年），頁342。

² 〔明〕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見〔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附錄三，頁750。

2 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

此一論點可從兩個文化層面來作分析：以科學制度來看，唐、宋科舉均有「詩賦」之科，明代則轉以「制義」取士，當詩賦不再作為仕進的工具後，其獨立價值反而更能彰顯，文人也將有更寬廣的空間馳騁個人的才情，文章的貴賤於是由操之在上轉變為操之在下、操之在我；再以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明人從事詩文創作的人數遠較前代為多，書籍的刊刻流傳也更加便利，文章的優劣判定可以因而形成眾議，而非一二權威人士所能專斷，在此一情勢下，文人們也就更有相互結盟、彼此引重的必要。夏允彝的這段說法，間接反映出明代文學派別紛然興起的重要原因。

明代文學流派固然繁多，但以詩歌而論，真正能叱咤一時並深具影響力的派別，則不外乎清人程夢星（1679-1755）〈國朝詩的序〉的這段描述：

至於明，始有格調、氣勢之論矣。古必漢魏，律必盛唐，舉宋、齊、梁、陳暨大曆以降之作，悉棄而弗采，實云隘矣。於是何、李倡於前，王、李沿於後。公安、竟陵矯之，雲間諸子復小異之，而一代之詩局遂終。³

程夢星雖對前、後七子的「格調」之說頗有微辭，卻也不得不承認，尊崇漢魏古詩、盛唐律詩的復古思想實為明代詩學的主流，故謂何景明（1483-1521）、李夢陽（1472-1529）倡於前，王世貞

³ 〔清〕陶煊、張璨編：《國朝詩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6-158冊），程夢星〈序〉，冊156，頁438。程夢星，字伍喬，一字午橋，江蘇江都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

（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沿於後。前、後七子以降，則有袁宏道（1568-1610）爲首的公安派以及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爲首的竟陵派，二派之持論皆在於矯正七子派的擬古之弊；再至陳子龍、李雯（1607-1647）等雲間諸子出，雖重倡復古之論卻又有別於前、後七子，於是總結了有明一代之詩局。此段關於明代詩歌派別之流變的扼要敘述，並未顧及以李東陽（1447-1516）爲首的茶陵派，以及王慎中（1509-1559）、唐順之（1507-1560）爲首的唐宋派，然茶陵派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本在於啓迪前七子⁴，唐宋派則主要是一個文派，對二派略而不論，當亦無損論述的完整性。

程夢星視前七子、後七子、雲間詩派爲明代詩歌復古的三階段，此一看法實爲清初論者的通見，宋琬（1614-1674）〈周釜山詩序〉說得更清楚：

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為之冠。……雲間之學，始于幾社，陳臥子、李舒章有廓清摧陷之功。於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為天下所信從。⁵

⁴ 如胡應麟（1551-1602）云：「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隳。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見〔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續編〉，卷1，頁345。

⁵ 〔清〕宋琬：《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安雅堂文集》，卷1，頁13。周釜山，即周茂源（1614-？），字宿來，江蘇華亭人，順

4 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

論中以弘治時期之李何、嘉靖時期之王李、崇禎時期之陳李爲明詩三盛，評價標準雖和程夢星不同，但對於明詩演變進程的認識則二說無別。而此明代的復古三派中，雲間詩派可說是當今學界研究較欠充分的一個派別。以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一書爲例，此部討論明代復古派的重要著作，詳述了明代詩文復古運動三次高潮的發展歷程，並以前七子、後七子、復社與幾社分別作爲三次高潮的代表團體⁶；但如宋琬所云，「雲間之學，始於幾社」，幾社其實只是雲間詩學的起始，與雲間詩派的內涵並不同，依此而論，廖可斌書對於雲間詩派的著墨明顯少於前、後七子。近數年，雖陸續亦有以雲間派爲研究對象的著作問世，但真正全面而深入的論析雲間詩派之詩歌理論者，也仍不多見。因此，本書定題爲《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試圖從詩學流變的動態視角進行考察，以期對於此一總結明代並開啓清代之詩局的重要詩派作更細緻的描繪。

本書的研究範圍、研究旨趣以及與前人相關研究的論述差異，均可藉由題目的界義來作說明。以下即分就書題中的「雲間詩派」、「詩學」、「發展與流衍」諸詞略作疏釋。

先釋「雲間詩派」。本書所指的「雲間詩派」，即明清之際詩學領域中的「雲間派」；此一派別以陳子龍居首，派中成員多

治六年（1649）進士。

⁶ 參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此書在大陸出版時，略去了復古派以外的章節，題曰《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隸籍於南直隸松江府⁷，松江舊稱雲間，後人遂以「雲間」名其派。此處標舉「詩派」一詞，主要是爲了與「詞派」作一區隔。眾所周知，陳子龍除了是雲間詩派的領袖之外，同時也是雲間詞派的宗主，但本書探討的議題限定於詩學，故不述及雲間詞派的相關內容⁸。如此區隔，並無意切割雲間詩派與雲間詞派的關聯性，而是爲了確定本書的寫作主旨。然而，人文薈萃的松江一邑，在陳子龍之前亦嘗有詩派出現，這些早於陳子龍的雲間地區之詩派，亦非本書所欲討論的對象，必須再作辨明。

觀袁宏道〈閱袁履善詩〉云：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澗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談謔，略無老態，余極喜之。⁹

袁履善，即袁福徵，松江府華亭人，嘉靖二十三（1544）進士，嘗與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於刑部共聯詩社。王世貞《藝苑卮言》

⁷ 松江府在明朝屬於南直隸，明清易代後，順治二年（1645）改南直隸爲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又將江南省劃分爲江蘇、安徽二省，故松江府後歸江蘇省管轄。本書在標註人物籍貫時，於明人皆用明制，於清人則採用康熙六年以後之新制。

⁸ 關於雲間詞派的研究，可參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59-98；姚蓉：《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85。

⁹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頁198。

提到：「明年爲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¹⁰即記載嘉靖二十七年（1548）時，在袁福徵等人的引薦下加入刑部詩社一事。袁宏道此文作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當年袁福徵已八十多歲，卻仍賦詩不輟，文中所言「松江派」，即指當時雲間詩人仿效其詩作所形成的風格流派。根據袁宏道的評述，袁福徵詩大約有三項特點：其一，喜作同題聯章，詩思敏捷，正合於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所評：「其警敏實一世少敵，爲詩多奇俊語，又頃刻數百言，談笑風流，後來未見其比。」¹¹其二，其詩「意艱詞刻」，拗澀難讀，但此一風格應非苦心雕琢得來，而是如張所望（1556-1635）《閱耕餘錄》所述：「袁公……爲詩文別出機杼，不欲一字襲，故而棘叻聱牙，時或不免。」¹²其三，履善爲人「軒爽詼謔」，則其詩作或亦有詼諧之趣。如此詩風，與李攀龍、王世貞的復古取向已大相徑庭，無怪乎能得到袁中郎的大力讚賞。袁福徵詩集今已無傳，其詩作僅見載於清人姚宏緒所編《松風餘韻》，對於稱袁福徵詩爲「松江派

¹⁰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歷代詩話續編》本），卷7，頁1068。吳峻伯，即吳維嶽（1514-1569），浙江孝豐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王新甫，即王宗沐（1523-1591），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

¹¹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華亭故相被脅」條，頁220。

¹² [明]張所望：《閱耕餘錄》（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0冊），卷6，「王元美贈袁公詩」條，頁128。張所望，字叔翹，南直隸上海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

」的說法，姚宏緒書中提出強力的反駁，論云：「長史（袁福徵）類滑稽者流，詩皆衝吻而出，不事選擇，雖多，亦奚以爲？長史之詩不盡傳，長史之幸也；不盡傳而尚有傳者，亦生於長史後者之幸也。若曰此『松江派』也，則置陳、夏於何地？謂之無目者可也。」¹³姚宏緒以雲間後學的立場發言，以爲袁福徵詩多脫口而出，直率有餘而精鍊不足，實未足以稱派；真正開啓雲間詩派之正脈者，當推陳子龍、夏允彝諸子¹⁴。此一說法係以詩歌成就的高低來判斷詩派的存在與否，論點未必適當，然其說卻清楚表明：萬曆松江派與崇禎雲間派詩風各別，其間並無傳承關係。

再觀錢謙益（1582-1664）《列朝詩集·唐瞽者汝詢》云：

汝詢字仲言，雲間人。……仲言之兄汝諤，篤嗜王、李之學，仲言童而習之，故其於詩未能超詣，蓋亦雲間流派如此。¹⁵

唐汝諤（1555-？）、唐汝詢（1565-？）亦松江府華亭人，兄弟二

¹³ 〔清〕姚宏緒編：《松風餘韻》（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37冊），卷14，頁275。袁福徵曾任唐府左長史，故文中以「長史」稱之。姚宏緒，字起陶，江蘇婁縣人，康熙三十年（1691）進士。

¹⁴ 雲間派應以陳子龍、李雯爲代表，姚宏緒不言「陳、李」而言「陳、夏」，實是著眼於詩人的氣節。此點，可參考姚宏緒評夏允彝曰：「先生與陳黃門志刷衰靡，創舉幾社，可謂身負清流，名高月旦矣。而竟伸大義，靖節松塘，似出黃門之上。」同前註，卷39，頁560。

¹⁵ 〔清〕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丁集〉第十，頁5067。

人分別以《古詩解》、《唐詩解》名世¹⁶，於詩歌創作方面，則尊奉王、李之教，以復古為宗。天啓年間，年約七旬的唐汝諤擔任常熟縣教諭¹⁷，曾與錢謙益發生文學論爭，錢謙益在〈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中指出：「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掉鞅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為世之承學啓聾發聵，其為功於斯文也，可謂專且博矣。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王弼州為依歸，殆以為至於斯極者。」¹⁸另觀唐汝詢〈上李本寧先生〉一詩云：「風雅淪喪久，北地開草昧。濟南振長策，制作忽大備。近者準開天，遠者超漢魏，巖巖世穆朝，人文滿天地。」¹⁹由此二則資料，益可確認唐汝諤、唐汝詢兄弟之詩學漸向確實是推尊李攀龍、王世貞，並以後七子所處的世宗（嘉靖）、穆宗（隆慶）二朝為明詩盛世。不過，唐汝諤長陳子龍五十三歲，唐汝詢長陳子龍四十三歲，當陳子龍於崇禎年間嶄露鋒芒時，二人即使在世，亦俱老邁矣，因此《列朝詩集》所云「蓋亦雲間流派如此」，非謂陳子龍所領導的詩歌派別，而是指唐汝諤、唐汝詢

¹⁶ 唐汝諤《古詩解》、唐汝詢《唐詩解》，分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0冊、集部第369-37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¹⁷ 《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微言合參》八卷，明唐汝諤撰。汝諤字士雅，華亭人，天啓中以歲貢生官常熟縣教諭。」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17，頁383。

¹⁸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錢牧齋全集》本），卷79，頁1700-1701。唐汝諤致錢謙益書未存。

¹⁹ 〔明〕唐汝詢：《編蓬後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2冊），卷2，頁676。此詩寫給李維楨（1547-1626）。

活躍於文壇時雲間一邑的復古風氣。此點，最多只能證明陳子龍所提倡的復古之學，在萬曆、天啓間，亦曾一度流行於雲間，但二者仍不當混淆。

次釋「詩學」。「詩學」一詞的用法古今不同，除去表示《詩經》學的「《詩》學」不論，在傳統意涵上，此一詞彙主要是指詩歌創作的素養與技藝，以及由此素養、技藝所體現的創作成果。此語最早見於晚唐詩人鄭谷〈中年〉一詩：

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編改數聯。²⁰

句中的「添詩學」，正是詩人的創作素養、技藝再上層樓之意。另如南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

近時詩學盛興，然難得全美，聊隨所見，摘錄一二。趙東山〈郵亭詩〉：「風雨送迎地，別離多少人。」劉雲岫綸〈喜晴詩〉：「雲影猶帶溼，日光初漏明。」顧秋鶴夢日〈夜游詩〉：「路轉歌聲杳，夜長衣露濃。美人行月下，秋水汎芙蓉。」²¹

此處的「詩學盛興」，更擴大到整個時代來說，意謂當時詩人的詩歌造詣普遍提昇，而詩藝的精進仍須呈現於實際作品，故文中舉出時人的佳句，以作為一代詩學繁盛的證明。整體而論，「詩

²⁰ 〔唐〕鄭谷著，傅義校注：《鄭谷詩集編年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60。「前編」，一作「前題」。

²¹ 〔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頁63。

學」一詞自晚唐出現以來，歷代沿用，意涵相當穩定²²，即使元明以後出現若干以「詩學」命名的詩格、詩法之作，如范梈《詩學禁癰》、周敘《詩學梯航》、黃溥《詩學權輿》等²³，但這些書名大約是「作詩祕訣」、「作詩進階」、「作詩入門」之意，其中的「詩學」仍是就詩歌創作而言，非謂詩歌理論。

「詩學」一詞的意涵發生轉變實為晚近之事，原因則與西方學術的傳入以及文學知識系統化的時代趨勢有關。試看朱光潛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自題《詩論》之序文云：

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文藝復興，一般研究文學理論的著作都叫做詩學。……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於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想，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鍊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²⁴

受亞里士多德以降西方詩學的影響，朱光潛主張也以科學的精神

²² 相關例證，可參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8。

²³ 諸書分見題〔元〕范梈：《詩學禁癰》（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歷代詩話》本），頁756-762；〔明〕周敘：《詩學梯航》（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全明詩話》本），頁87-108；〔明〕黃溥：《詩學權輿》（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92冊），頁1-231。周敘，字公敘，江西吉水人，永樂十六年（1418）進士；黃溥，字澄濟，江西弋陽人，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

²⁴ 朱光潛：《詩論》（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2年），〈抗戰版序〉，頁1。

和方法來探討中國的詩歌理論，因而有《詩論》之作。序文提到「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此一斷言不免陷入以西方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偏執，事實上，中國自有其風格獨特的詩學，只是中國詩學的條理、系統乃是一種「潛體系」²⁵，與西方詩學的「顯體系」型態有別。我們不全然同意朱光潛的論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稱的「詩學」已非傳統舊義，而是指涉詩歌理論。此一新用法在中國詩論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專門學科後，已逐漸為學者們所接受，今人著作中，如李壯鷹《中國詩學六論》、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蕭榮華《中國詩學思想史》、陳伯海《中國詩學之現代觀》等²⁶，書名皆採此一後起之義。

同樣的，本書書題的「詩學」一詞也使用當代意涵，意指詩歌理論、詩歌批評；惟古人以創作之事為「詩學」的說法也有可資參考處，畢竟古典詩論的最終訴求，仍在於指導詩人的創作。因此，本書探究的議題雖在於雲間詩派的詩歌理論，但在論析詩人如何將詩學思想轉化為具體實踐時，也將適度的援引作品以為證。目前的雲間派研究成果，以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劉

²⁵ 中國詩學的「潛體系」特質，可參考李壯鷹之說：「我國的傳統文論在表面形態上雖然是零散而缺乏系統的，但卻存在著嚴密的體系，只不過這個體系內在地隱埋在零散的形式背後，它是一種『潛體系』。」見李壯鷹：《中國詩學六論》（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32。

²⁶ 李壯鷹書見前註，其他三書之出版項為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蕭榮華：《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陳伯海：《中國詩學之現代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